

批林批孔发言材料

供讨论修改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讲稿

(初 稿)

六十六军军直通信站

一九七四年八月

目 录

- 一、秦、汉时期 (1—15)
- 二、隋、唐时期 (16—26)
- 三、宋、元、明时期 (27—41)
- 四、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(42—59)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讲稿

秦、汉 时 期

战士 邓 莉(女) 班长 焦瑞霞(女) 报务主任 李修宇

同志们：

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，我们通信站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“**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**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759页）的教导，最近，展开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学习和研究。我们体会到，用马列主义的观点，学习农民战争史，充分认识农民革命的伟大作用，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孔，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**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**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1376页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历史，就是这样一部阶级斗争史。在封建社会里，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，曾引起了数百次的农民起义。从陈胜、吴广到太平天国，我国劳动人民不畏艰险，前仆后继，写出了一部光辉灿烂的斗争历史。农民起义，杀官

吏、除民害、横扫旧思想，摧毁旧制度，“**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，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**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588页）

可是，几千年来，剥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，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，总是用极为卑劣的手法，歪曲历史真象，大肆诬蔑农民革命战争，一笔抹煞它的伟大历史功勋。在他们的笔下，那些镇压农民起义，骑在人民头上的刽子手倒成了历史的英雄和救世主，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，却被诬蔑为“群氓”和“盗贼”。

当这些历史的旧案和偏见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人民革命的洪流扫荡的时候，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又改头换面地贩卖历史唯心主义，宣扬所谓“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”的谬论，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。对此，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武器，进行彻底的批判，把被颠倒的历史，再正过来。

下面分四个时期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：一、秦汉时期；二、隋唐时期；三、宋元明时期；四、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革命。现在，我先介绍秦汉时期农民起义的简要情况。

秦朝、两汉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政权，是新兴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

的重要时刻。因而，这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也同这场反复辟斗争紧密联系。到西汉后期，封建制得到巩固和发展，地主阶级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，这时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。秦汉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，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，横扫了奴隶制复辟势力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。

(一) 秦末农民大起义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，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——秦王朝。秦始皇是一位厚今薄古的专家。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，他实践法家路线，反对儒家路线，行郡县制，废分封制，“焚书坑儒”，镇压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。他修驰道，抗匈奴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对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、文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这都是应该肯定的。但秦始皇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，阶级本性决定他必然对农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。由于阶级的局限性，秦始皇镇反不可能彻底。他只坑了四百多个儒，而对许多反动儒家和奴隶主都养了起来，这就留下了复辟的祸根。因而，秦二世当政后，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反动儒家、奴隶主贵族代表人物赵高手里。他肆无忌惮地大搞倒退复辟活动，完全推行了儒家路线，政治上更加腐朽，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。徭役、兵役十分繁

重，使得大量的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，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和破坏；赋税沉重，“田租口赋，盐铁之利，二十倍于古”。^①当时的法律又极为苛刻，一人犯法全家及邻居都要连带问罪。赵高这种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，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。陈胜、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，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。

陈胜又叫陈涉，阳城（今河南登封县东南）人，雇农出身；吴广又叫吴叔，阳夏（河南太康县）人，也是贫苦农民。陈胜年青的时候曾对一起干活的伙伴说：“日后谁富贵了，不要忘记一起干活的穷兄弟”（“苟富贵，无相忘”）。^②这话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翻身的强烈愿望，反映了农民对孔老二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反动说教的蔑视。

公元前209年7月，陈胜、吴广等九百名贫苦农民，被征往渔阳（河北密云县西南）守边。走到大泽乡（今安徽宿县西南）时，遇到大雨，道路不通，无法按期赶到渔阳了。按照秦王朝的法律，误期就要处死。怎么办？与其被处死，不如起来造反。陈胜、吴广果断地杀死了两个押送的都尉。接着陈胜把大家召集起来说：“咱们因为遇到大雨，误了日期。误期要杀头，就是不杀头，到渔阳守边十有六、七也要死，壮士不死则罢，死就要死在起义造反上，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^③？”陈胜的话激发了大家起义造反的勇气。顿时，呼声震天，群起响应。他

们“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”，④共推陈胜为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组成了农民起义大军。他们攻城池，杀县令，除郡守，势如破竹，迅猛异常，很快攻下了蕲县（安徽宿县）。十天左右，就向西南进军数百里，连克五座县城。在进攻陈县（河南淮阳）时，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、七百辆，骑兵千余人，步兵几万人了。起义军的革命行动，严正地批判了孔老二不准“犯上作乱”的反动说教，打乱了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。

农民起义军声势日益扩大。四面八方的贫苦农民“从之如流水”，形势一派大好。建立农民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原来失去权势的反动儒生和六国贵族复辟势力的一些代表人物，因为他们对秦的统一始终心怀不满，也乘机打起“造反”的旗号，混进陈胜、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，干起复辟、倒退的反革命勾当来。反动儒生陈余和六国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张耳，阻拦农民起义军建立自己的政权，劝说陈胜派人到各地重建六国的诸侯，妄图使国家重新倒退到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去。陈胜断然拒绝了他们开历史倒车的意见，在陈县立为王，定国号“张楚”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政权，打击了这股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反动逆流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步历史上复辟势力的后尘，妄图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“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”，使中国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去，这和当年张耳、陈余之

流“立六国后”的反动主张毫无两样。

但是，斗争并没有结束。混进起义军的复辟势力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。陈胜称王后，命令周文率大军十万西征。当打到离秦都咸阳只有百十里的戏（陕西临潼境内）时，遇到秦将章邯的抵抗。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，混进起义军的孔老二八世孙孔鲋跳了出来，他趁机散布右倾悲观情绪，说什么，“章邯是秦朝的名将，周文不是他的对手”。并说如果与章邯打，那就是不“应天祥”，必然要“跌而不振，悔之无及”。陈胜不听他的胡言乱语，当场驳斥道：“儒者可与守成，难与进取。”^⑤陈胜这话无情揭露了反动儒家因循守旧、反对革命的丑恶嘴脸。

起义军的部将武臣，当率兵打到邯郸时，在张耳、陈余的阴谋策动下也自立为王，大搞分裂活动。他们公然抗拒起义军领袖陈胜的命令，不仅不协助主力向西攻秦，而且在北方大肆扩充地盘，使西进的主力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，大好的革命形势受到严重的威胁。秦二世2年12月，叛徒庄贾暗杀了陈胜。但这一叛卖行为并没有挫伤起义军抗秦的意志，陈胜的部将吕臣重组“苍头军”，反攻陈县，处决了叛徒庄贾。以后反复与敌人争夺陈县，表现了起义军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和英雄气概。

陈胜、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。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第一次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火炬。在短短六个月中，革命的

风暴席卷全国，推翻了秦朝的统治，粉碎了赵高集团复辟奴隶制的阴谋，横扫了六国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，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。

这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，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指明了道路，树立了榜样，给我国劳动人民留下了十分宝贵斗争经验，这就是：

第一、要坚决打击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势力。起义军在陈县建立政权后，只注意到扩大抗秦力量的一面，面对混进起义军内部的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的复辟、破坏活动，警惕不够。虽然做了些斗争，但不够有力。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。

第二、要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。坚强的团结，是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。起义军在创建初期团结状况是好的，但以后有的领导在胜利的情况下骄傲自满，盲目轻敌，特别是部将田臧，因为和主帅吴广意见不和，就杀了吴广，使起义军主力受到很大损失。

第三、要联合革命的力量。当时，在陈胜的影响下，各地人民纷纷起义，形势发展很快。但陈胜没有注意联合这些新起的反秦力量，形成联合的反秦战线，以致起义受挫时陷于孤军奋斗的困境。

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尽管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，但他们在战争的危急关头，都以坚决的意志、顽强的精神，与强敌展开了英勇的搏斗。这种崇高的革命气节，是永远值得

得称颂的。

(二) 西汉末年绿林、赤眉农民大起义

公元前206年，法家代表人物刘邦借起义军的力量建立了西汉王朝，共统治214年。西汉前期，地主阶级还是生气勃勃的阶级，还继承着秦始皇的法家路线。汉元帝以后政权得到了巩固，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起了变化，就转为尊儒反法了。结果使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西汉末年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，农民起义不断发生，西汉王朝摇摇欲坠。这时大地主、大贵族的代表人物王莽，用欺骗的手法于公元8年夺取了汉政权，当了皇帝。王莽为巩固其统治，实行所谓改制。他把奴隶制社会的“井田制”硬搬到封建社会来实行。改民间的奴婢为“私属”，表面上禁止了买卖，实际上是承认私人占有奴婢；还实行苛刻的刑法，把大批农民以所谓“犯法”为借口变为官奴。这种赤裸裸的反革命复古倒退路线，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，使得阶级矛盾更加激化。于是爆发了著名的绿林、赤眉农民大起义。

赤眉军在北方起义，首领是琅邪郡（今山东诸城）人樊崇。为避免同敌军相混，他们把眉毛染成红色，所以称作“赤眉军”。

在北方各地，还有铜马等几十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兴起。这些起义军严惩官吏贵族和豪强地主，歼灭了王莽的

很多军队，大大震动了王莽的反动统治。赤眉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连续取得了三次巨大胜利。其中，公元22年4月，王莽派太师王匡（不是绿林军的王匡）和更始将军廉丹统兵十多万人，企图一举消灭赤眉军。王莽的军队很腐败，杀人放火无恶不做。当时人民唱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“宁逢赤眉，莫逢太师，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”广大人民非常痛恨莽军，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失败。事实正是这样，赤眉军把莽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杀死了更始将军廉丹和部将数十人，太师王匡狼狈逃命。起义军乘胜追击，解放了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等大片土地，革命火焰烧红了半壁河山。

绿林起义军是由新市人王匡、王凤领导的，基本队伍是长江中游荆州地区的饥民。他们以绿林山（湖北境内）为根据地，反抗地主阶级政权。所以，称为绿林军，几个月就发展到七、八千人。历史上“绿林好汉”、“绿林英雄”的称号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绿林军从公元21年到22年大量消灭莽军的有生力量，发展到十多万人。第二年他们率兵北上，向王莽政权首都长安进发，接连攻占昆阳（河南叶县）等地。王莽气急败坏，集中了四十二万人，号称百万，由王邑、王寻带领把昆阳城围困起来。当时农民起义军在昆阳只有七、八千人，两军兵力极为悬殊。莽军遍地树旗击鼓，不断发动猛攻，向城里乱箭齐发，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，形势十分紧迫。

农民起义军认为，守住昆阳城，既有利于夺取长安，又可以保住起义军的政权，战略意义很大。于是他们坚守昆阳，毫无惧色，沉着应战。依靠人民的支援，打退了莽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并且派人乘黑夜冲出重围组织援军。一个月后，一万多名援军赶到昆阳附近，对此，莽军头子根本没有放在眼里。绿林军乘敌人松懈和主将轻敌的弱点，精选勇士三千人组成突击队，采用灵活的战术，迂回到城西，涉过昆水，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莽军指挥部，杀死敌军将领王寻。失去指挥的莽军四散逃命，乱了阵脚。这时昆阳城内起义军在王凤、王常领导下冲杀出来。在起义军的内外夹攻下，莽军大乱，自相践踏。起义军乘胜追击，直捣长安，攻入王宫，结果了王莽的狗命。这个搞复古倒退的家伙，受到了农民革命的应有惩罚。

昆阳之战是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（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第458页）中提到的一个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。莽军数量上超过绿林军二十倍，而且拥有足够的物资装备，但绿林军却取得了胜利，原因在哪里呢？

一是莽军头子残暴骄傲，搞的是儒家形而上学的战争指挥，只仗人数多，装备好，只看自己长处，不看自己的短处，这就必败无疑。

二是起义军不畏强敌，沉着应战。他们为了进攻而“先让一步”，守据昆阳这个有利地形；并集中了外围兵力，抓住战机，出其不意直捣敌人既薄弱又要害的指挥机

关，使莽军陷于瘫痪，进而全歼。

三是王莽推行的是一条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，绿林军为推翻王莽的残暴统治而战，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，所以能够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，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这是王莽失败和绿林军胜利的根本原因。而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在井冈山斗争期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，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形势，错误地估计阶级力量。他看不到蒋介石所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非正义战争，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。他被国民党所谓“优势”吓破了胆，散布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悲观论调；在抗日战争中，他妄想依靠蒋介石取得胜利；解放战争时期，在东北战场又不敢与敌人决战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。

（三）有组织有纲领的黄巾起义

轰轰烈烈的绿林赤眉大起义，奋战了十年头，推翻了反动的王莽政权，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。公元25年，南阳大地主刘秀窃取了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，建立了东汉政权，共统治了195年。

东汉时期，官僚、豪强地主和大商人，兼并土地的现象恶性发展。他们“膏田满野”，拥有巨大的财富。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，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。汉和帝以后，政治上又出现了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的局面。无论谁上台，都乘机扩张自己的实力，拼命地掠夺土地，搜

刮人民。农民无法生活下去。出现了“人多饿死”或“人相食”的惨状。恩格斯指出：“当苦难已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就会再次发生起义”^⑥。自安帝以后的七十年间，爆发了大小百余次农民起义。参加斗争的农民越来越多，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，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。

张角，河北巨鹿（今平乡县）人。他以“传道”和给人治病做掩护，在农民中间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。他提出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的口号，派人到全国各地广为宣传。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的政治含意是：东汉王朝已经衰败腐朽，应该用农民阶级政权来代替它。这个口号明确地提出了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，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。

黄巾起义的革命纲领，主张“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，以供人养也”，“太仓之粟，本非独鼠有也”^⑦。痛斥那些不劳而食的统治阶级是“其罪不除”的寄生虫。这种朴素的平均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，也是对孔孟之道鼓吹的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等反动思想的有力回击。

黄巾起义的准备阶段，以宗教做掩护，参加群众很多。张角把“八州”的三十六万多信“道”群众编为三十六个方（军事单位）。经过充分调查和周密考虑，张角和他的战友最后选定“甲子年”（公元184年）3月5日为全国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的日期。可是，当起义日期快要到来

的时候，革命队伍内部突然出现了叛徒唐周，向东汉朝廷告密，起义计划全部暴露，东汉政府立即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措施，使一千多人被捕，英勇就义。

在这危急关头，张角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胆略。他当机立断，决定提前起义，先机制敌。并规定以黄巾包头为标记，因此被称为黄巾军。

黄巾军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东汉政府和整个地主阶级，战斗刚打响，南阳、广阳和汝南的黄巾军就攻杀了太守，夺取了城池。河北群众活捉皇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，以示响应。黄巾主力部队则分兵环攻京师洛阳。“旬日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”一个月就席卷了长江以北直至河北的广大地区。他们占据州郡，焚烧官府，镇压豪强，没收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，夺回被强占的土地，吓得官吏如鸟兽散，打得“官军”胆战心惊。

黄巾军的巨大胜利，吓坏了东汉王朝。他们纠集反革命军队，向起义军猛扑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起义军在颍川战场上，击败了汉军四万多步兵和骑兵。在南阳战场上，起义军和汉军激战了一百多天，给反动官兵以沉重打击。在河北战场上，张角兄弟亲自领导作战，攻克广宗和下曲阳（今河北晋县西），攻势凌厉，所向披靡。以后，他们又多次击败了汉军。十月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皇甫嵩率兵进攻广宗。这时，黄巾军的杰出领袖张角病死。其弟张梁任统帅，与皇甫嵩军在广宗展开激战，打得皇甫嵩紧

闭城门不敢出来。以后起义军由于屡打胜仗，就放松了警惕。结果皇甫嵩趁黑夜发动突然袭击，起义军仓卒应战。张梁等8万余人壮烈牺牲，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。

列宁说过：“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，受折磨，处于贫穷愚昧、粗野的境地，他们进行革命，是不会不犯错误的。”^⑧黄巾军也正是这样，他们虽然八州并起，但被迫仓卒起义，力量尚未来得及集中就和敌人主力作战，以分散的力量对付强大的敌人。加之在战略上没有避实击虚，打了一些消耗战。因而，被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各个击破。

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备、有组织的农民革命战争。黄巾英雄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敢于战斗，敢于胜利的革命造反精神，在广大地区内诛杀贪官污吏和大大小小的豪强地主，荡涤一切腐朽势力，以革命的暴力打击了地主阶级，制止了东汉后期疯狂的土地兼并趋势，使得一部分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，这就为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打下了恢复和发展的基础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。

黄巾起义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反孔斗争。东汉章帝时，极力宣扬董仲舒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形而上学思想，把封建统治说成是永恒不变的。而黄巾英雄们不畏“天命”，高举造反大旗，提出了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的革命口

号，要变地主阶级的“苍天”为农民阶级的“黄天”。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反动思想的一次大冲击。历代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，为了欺骗人民，维护其反动统治，都在“天”字上大作文章，什么“受天永命”、“天生的龙种”等等。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毫不例外，他也扯起董仲舒“奉天法古”的破旗；妄图重整孔老二的“家业”，自比“天马”，无耻的自夸“脑袋长得好”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林彪与孔老二和董仲舒是一丘之貉。他妄图阻挡社会主义的革命潮流，结果同他的反革命愿望适得其反。“**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**”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把林彪这类倒行逆施的小丑碾得粉碎。

〔注〕

- ①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
- ②③④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
- ⑤《孔丛子·答问》
- ⑥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五卷，第四三六页
- ⑦《太平经》
- ⑧《列宁全集》第二八卷五三页